



近年来东北诗歌创作的格局与态势

□张立群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诗歌”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东北诗歌”一直由于诗人们居住地的改变而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一点一旦和那些出生于东北、长于东北、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东北,成为其他地区重要诗人的情况(如王小妮等)联系起来便会更加明显,反之亦然,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结合诗人创作实绩的前提下,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整体意义上的“东北诗歌”。

按照新世纪以来谈论某一地域、某一省份诗歌的习惯方式,即这一地区有哪些“知名诗人”可以代表其创作及成就,近年来东北诗歌在整体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诗人群及其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指出每一省份的代表诗人。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大致可以以李松涛、王鸣久、胡世宗、柳云、巴音博罗、萨仁图娅、麦城、刘川、赵明舒、哑地、宁明、李皓、陈美明、大路朝天以及林雪、李轻松、宋晓杰、川美、夏雨、娜仁琪琪格、李见心、苏浅、王妍丁、玉上烟、微雨含烟、黑眼睛、苏笑嫣等为代表的辽宁诗人;以张洪波、孙慧峰、魏连春、胡卫民、谭广超、董喜阳以及南永前、额鲁特·珊丹等为代表的吉林诗人;以张曙光、桑克、马永波、李琦、冯晏、潘洗尘、潘虹莉、王雪莹、吴铭铄、原筱菲等为代表的黑龙江诗人,从空间上描绘当前东北诗歌的版图。从这样一份长长的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些年东北诗歌在

整体上可谓阵容强大,成绩斐然。当然,除了上述按照省份的方式认知外,近年来东北诗歌还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呈现出新的认知角度。比如,按照诗人的身份、性别、题材取向等,近年来东北诗歌就可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女性诗人”、“军旅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编辑诗人”等群落;而按照诗人走上诗坛的时间与个人的年龄构成,则又分为“1980年代诗人”、“1990年代诗人”、“新世纪以来诗人”和“1950年代出生”、“1960年代出生”以及所谓的“70后”、“80后”、“90后”诗人群。结合近年来东北诗歌发展的新趋向,上述诗人群体还可以从更小的单元进行划分,如从诗人较为集中的角度进行考察还可分出“大连诗人”等群体。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近年来东北诗歌本身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是以,越是想对近年来东北诗歌进行具体的归类,就越会发现这种归类在实践中共会有不确切、不完整之处。不过,它却可以在那份长长的名单外,更为多元、繁复地拓展近年来东北诗歌的认知视野与角度。

谈及东北,总会让人自然联想到白山黑水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尽管简单从地域对诗歌影响的角度谈及东北诗歌难免会让人感到牵强,但以辩证的方式论及东北诗歌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显然是正确的。毕竟东北诗人在

成长和写作过程中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是如此,因而,他们的诗中有意或无意出现属于本地的意象让人并不感到意外,相反地,这些独具特色的意象及词语会给读者带来某种新鲜感。以桑克的创作为例:《圣·索非亚大教堂附近》《圣·伊维尔教堂》等作品就与诗人的居住地哈尔滨的历史文化有关;名作《雪的教育》是一次近乎串起桑克成长至当下生存状况全部的精神记录,同时,也是集中体现其“地理意识”的作品。“在东北这么多年/没见过干净的雪”,城市居民的沮丧抱怨,轻易地将“雪景”置于一个地域视野之内,同时,也为下文的视角转换埋下伏笔。“乡下”、“森林”,雪“清洁”而富有“营养”,其美丽的姿态和安静的睡姿,联系起“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和几近失传的游戏”。然而,接下来的“在国防公路上,它被挤压/仿佛轮胎的模块儿。”却将诗人急待表达的意图之“位置”指点出来:“国防公路”延续着前面对城市和乡村的连接,同时又将诗歌赋予了重大主题意识。显然,诗人借助了自己熟悉的“雪”实现了一次从自然环境到主体自我的诗意转换。至于他在诗中所言的“我始终在雪仁慈的教育下”,则不但是关于地域的,同时,也是关于诗人自身的领悟,“雪的教育”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除在具体写作中通过自然意象和文化意

象展现东北风情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些书写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记忆及相应的个性气质。以辽宁诗人巴音博罗为例,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以《莽式空齐》《吉祥女真》《苍狼之舞》《黑水白山》崛起于诗坛的满族诗人,从一开始就以雄浑的气势、地域的色彩和原始的生命强力,将满族历史和黑土地风物带给了读者。“我是一个旗人,但我用汉语写作,我一直把汉语当做我的母语,这是一种悲哀呢还是幸福?当那条名叫‘女真’的河流从我们的血液中流注‘华夏’的海洋时,我时常被这种浩瀚的人文景观所震撼……”有感于汉语之灯的光辉,有感于文化交融时灵魂的震颤,巴音博罗穿行于时光的长廊,触摸历史和文化的脉搏,这使其从登临诗坛伊始,便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诗艺追求。

与“地域性”相比,近年来东北诗歌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一支有声势、有影响的女性诗歌队伍,这一点,即使放眼全国也属少见。由辽宁女诗人萨仁图娅、林雪、李轻松、宋晓杰、川美、夏雨、娜仁琪琪格、李见心、苏浅、王妍丁、玉上烟、微雨含烟、黑眼睛、苏笑嫣等;吉林女诗人张牧宇、肖寒、额鲁特·珊丹等以及黑龙江女诗人李琦、冯晏、潘虹莉、王雪莹、原筱菲等,构成的女诗人队伍不仅人数众多,有代际、有传承,作品频繁发表于各大文学刊物,而且还有摘取“鲁迅文学奖”(林雪)、“华文青年诗人奖”并由此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站诗人(李轻松、宋晓杰)以及在散文诗界堪当翘楚的女诗人(宋晓杰)。除此之外,就是因部分女诗人过于集中、竞相出场而可以进一步划分出诸如“铁岭女诗人”群体如夏雨、海燕、逸飞、微雨含烟、潇雨晗、贺颖、董燕、黑眼睛等,女诗人人才辈出,此起彼伏,不由得让人们对其充满期待。

特定地域诗歌的发展总离不开相



应的阵地,为此,我们在肯定近年来东北诗歌成绩的同时,必须要对其发表园地予以关注。经历多年的坚守,东北诗歌现有的诗歌刊物主要包括黑龙江的《诗林》以及《读诗》《评诗》《译诗》,吉林的《诗选刊》(下半月)、《诗歌月刊》(下半月),辽宁的《诗潮》《中国诗人》等。上述诗歌刊物虽在出版形式上彼此各不相同,但经过多年的探索,业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这些刊物曾以不定期的形式,集中推出东北三省创作,对于活跃、繁荣和推广当代东北诗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年来东北诗歌虽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写作态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就地域性而言,东北诗歌虽各有代表性诗人但结构和资源配置并不平衡。或是由于出场年代的不同,或是由于代际及相应的写作趣味的差异,近年来东北诗歌虽不乏享誉全国的诗人,但就印象而言,东北诗歌似乎在先锋性和探索性上并未呈现出显著的趋向。就整体而言,东北诗歌又在不同程度上存有后劲不足、急需培养扶植的问题。相信在正视现实、充分利用资源、集中地域文化优势和切实推进跨省际诗歌交流等举措下,东北诗歌会有更为美好的前景。

作为地域文化书写者的孙惠芬

□张从嵘

在历史上,东北社会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间歇性和不连贯性,受之影响,这一区域的文化积累少,底蕴薄,文学创作水平层次始终不高。现代以前的东北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无法与关内创作等量齐观,在品质影响上也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相提并论。但五四之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从“东北流亡作家群”到“伪满文学”,从周立波、草明等的“社会主义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北大荒知青文学”,东北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北文学更呈现出诸多生长的痕迹,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孙惠芬是其中醒目的一个。多年来,她以“歇马山庄”的历史现实生活建构为中心,创生出庞大的人物群落和立体的情节结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交错,情节彼此平行,内容层层递进,随着作者的笔耕不辍,这个山庄的容量和版图在不断扩充。有些时候,我们回避作品名称直接谈论某个人物和情节不会引发任何歧义与困惑,因为它们几乎是所有文本所共享的。对于孙惠芬小说的主题无疑有多种归纳的可能性,而地域文化书写则是其中较易识别的一个。

孙惠芬小说聚焦距东北的历史。辽南离中原最近,所以在东北地区,它最早进入农耕社会,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最长,受汉文化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东北最为富庶的地区。清末民初,依托于关东铁路的修筑,辽南又成为中国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区域,旅顺、沈阳、锦州等城市不断发展,文化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孙惠芬长篇小说《秉德女人》的主人公王乃容生活史的起点就在那里。少女时代的王乃容的生活是悠闲而宁静的,可从阴差阳错地被土匪绑架的那一时刻开始,她就被抛入了未知的时间里,与之相关的生活亦被卷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中。王乃容及其家庭的经历不仅属于她个人和申氏家族,更是百年辽南农民沧桑史的一个缩影。无数人曾在王乃容经历见证的历史长河中奔波跋涉,这里有不远千里来到文明古国游历的欧洲人;有凶悍狡诈而又重义轻利的乡间悍匪;有在历史风潮中不断变换旗帜的乡绅枭雄;有走出乡下走向十字街头的爱国青年;有持重好色却终被历史抛弃的地主老财;有铤而走险油滑机敏的民间商人;有热衷艺术却在政治运动中莫名蒙难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变乱不居的大历史裹挟下左冲右撞和上下沉浮的辽南农民的命运。王乃容的生活不尽如意,命运也无法自主,但从她由被悍匪绑架的孤独女人生长为儿孙满堂的家族长者中,从她千辛万苦却始终自信而不失大家闺秀的流风余韵中,我们可以透视到辽南乡民在血火洗礼的历史磨砺中的坚忍不拔和生生不息。

孙惠芬小说自觉地书写着东北的民俗。风俗书写一直被视为塑造作品地域风格的主要力量。关东的饮

食文化、禁忌文化、祭祀文化、萨满文化等民俗事象在孙惠芬作品中俯拾即是。当代文学中的民俗叙事常作为主题的副产品和叙事的残余物而存在,可孙惠芬小说中的风俗描写却非情节中的悬浮之物,而是有所依傍,有所指向的。婚丧嫁娶不仅展示婚嫁礼俗的完型形态,而且是亲戚乡邻聚散离合的舞台;寿宴请吃不仅呈现地方饮食的风尚,而且昭示着家族的气象和人际的离合。风俗是作为铸造典型辽南乡村生活的容器而蛰居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它们丰富完整,却不繁文缛节,也不森严苛刻,在基本程式下有相当自主空间和选择余地。这是东北兼收并蓄、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的应然逻辑,也是新的时代环境下,风俗生活的规则性弱化和世俗性强化的表现。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定的个人气质和精神深度,但受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市场经济氛围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人格和行为方式常常是功利性的,虽然如此,但作者所欣赏的人物身上却往往都会在凡俗中升腾出一种不寻常的恢弘人格。这种恢弘人格付诸于事业则表现为“敢闯敢为”的创业精神。其小说塑造了一批社会底层出身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都以乞丐、流浪者、修鞋匠作为职业起点,但却通过不懈奋斗而获得了成功,他们被视为东北大地上新豪杰的不朽传奇而被代代传颂。当这种恢弘人格付诸于情感就化为“敢爱敢恨”的心灵品质。孙惠芬笔下最为活跃的角色大多是那种纯粹以感情为诉求、追求真爱、敢于挑战世俗的女性,虽然他们的选择不被环境所认知,甚至不被爱的对象所理解,但他们始终义无反顾、至死不渝。月月之于买子的爱情、吉宽之于许妹娜的爱情、梅花之于老姨夫的爱情皆属此类。应该说,这种恢弘人格和歇马山庄乡民在生活中普遍流露出的重情感经验,豪爽痛快,少文饰虚假,脾气暴躁、粗疏不细的性格,与闯关东历史文化孕育出的开拓精神和粗犷人性是根脉相通的。

孙惠芬小说呈现的是带有泥土气息的生活。在历史上,东北长期远离文化中心,思想文化的接受与革新都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同样处于时代变革的神经末梢,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羁绊,文化更新仍相对缓慢。这造成了东北人价值观念上的某种恒量和生活模式上的某种因袭。在歇马山庄,家族式的生活一直是乡民生存的常态。历史上的关东移民多为小户型和单身男性,所以东北历来就很难看到中原和南方地区的大家族生活,但家族式的生存方式却是人们所秉持和信赖的。家族不仅意味着血缘的联系和情感的维系,更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生存之道。以村干部与乡镇企业家为中心形成的家族利益共同体及其相应生活方式成为孙惠芬小说的主体景观。在歇马山庄,乡村权力犹如一双无形的大手掌控着所有人的生活与命脉。孙惠芬习惯在相互

依存又彼此对抗的干群关系中建立人物之间的联系。乡民对刘大头这样长期统治歇马山庄的大队书记既畏惧又厌恶,但也只能隐忍、屈从,这种被反复认知和强化了的环境秩序构成了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东北农村生活的真相。在歇马山庄,“两性关系”表现得有些放任自流。两性关系是孙惠芬小说的原始材料和叙事动机。很多时候,她笔下的两性关系似乎有些随意和无所顾忌,对之的评价也宽容朴素或莫衷一是。两性关系特别是那种有违道德的两性关系,给人物带来的烦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与情感的冲突,而多源自爱情选择的进退维谷,除去商业化写作意图不论,此中也有地域文化基因。清朝以来的东北移民多是来自山东和河北社会底层的流民,他们道德意识较为薄弱,关外精神管制和道德惩罚也不如关内森严苛刻,这就培育出东北人相对自由的身心及其两性关系。

孙惠芬小说在价值观念上与地域文化取向形成同构。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文化观念变化更新较慢,历史上日积月累形成的伦理意识和审美习惯在这片土地上持久而有效。“进城打工”和“被城市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普遍的选择和处境,也是“歇马山庄”乡民的主要出路。这种新的乡村主体意识决定着每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视野格局。孙惠芬笔下

的很多人都是城市的游历者和进城的寻梦者,虽然这些人永远摇摆摆在城乡之间,但孙惠芬小说却是实写乡村,虚写城市。城市要么陌生遥远地存在于乡民的谈论中,要么仅限于打工者触目可及的,诸如建筑工地、市井餐馆、昏暗录像厅、廉价舞厅等有限角落里,既不完整,也未被充分形象化。孙惠芬小说的城乡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城乡书写的分配不均上,还体现在色彩分明的价值判断上。歇马山庄只有非常孤独和不合时宜的小青对乡村格调和农村生活时刻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城市在大多乡民看来是问题丛生和污浊不堪的。进城是谋生的出路,回乡是永恒的归宿。这其中自然有作为城市底层的民工群体对城市的特殊理解,也符合中国文学素有的自然伦理观的表达泛型,但同时也有乡村人对城市及其文化的那种不期而然的心理印记。如果以城市现实为参照,孙惠芬小说的城市印象显然是片面和消极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乡村文化在城乡文化转型过程中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贬值而产生的焦虑,是习惯于乡村生活的乡民对城市文化的审美不适,这与南方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文学叙事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是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因生存压力小而形成的安于现状的心理模式和向后看的思维定式的流露。

